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出版通史

总顾问

石宗源 柳斌杰

2

魏晋南北朝卷

周少川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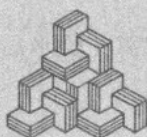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出版通史

总顾问

石宗源 柳斌杰



魏晋南北朝卷

周少川等

2

中国书籍出版社

新华书店
PD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出版通史·魏晋南北朝卷 / 周少川等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5068 - 1784 - 4

I. 中… II. 周… III. ①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
②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G239.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3909 号

责任编辑 / 游 翔

责任印制 / 熊 力 武雅彬

封面设计 / 敬人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51259192(总编室) (010)51259186(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30.25 彩页 4

字 数 / 435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6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有较长时间的封建割据、分裂和战乱，曾经被人看作是黑暗和倒退的时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经济和文化虽然遭到战乱的破坏，但是社会仍在继续发展，动荡和迁徙将北方的生产力和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了南方，开发了南方的经济，江南的繁荣后来超过了北方。边疆少数民族向中原地区的进发，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不仅有许多少数民族接受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汉民族也从中吸取其他民族的文化营养，从而提高了中华民族整体的活力，推动了一些边远、落后地区的社会进步。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出版事业在奠定基础后走向逐步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的继续发展、民族融合、中外交通为出版事业的初兴提供了经济基础和生产、流通的有利条件。同时，历朝统治者也大都比较重视图书的编撰和出版，如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晋武帝司马炎、梁武帝萧衍、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等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代表。出版事业顺应社会的需要，取得了许多具有时代特点的成就。

首先，在这三百多年中，虽然社会战乱频仍，然而学术思想却非常活跃。除了魏晋时出现的玄学外，传统的儒学也未停止发展，产生了大批新的经学注疏之作。佛教渐入华俗，魏晋以降，

更势如江河，不可遏止；而孕生于本土的道教也在此期盛行于南北。文学和艺术方面，诗、乐府民歌、文学批评和绘画、书法艺术大放异彩，诗文评、总集和类书等新文体、新体裁先后问世。史学、地理学得到飞跃式发展，史书的出版数量剧增。自然科学方面的算学、医学和农学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此期不仅出现了范缜、王弼、陈寿、陶渊明、祖冲之、王羲之、顾恺之等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画家和书法家，还产生了像《三国志》、《文心雕龙》、《文选》、《水经注》、《齐民要术》等传世的名著。各种新体裁、新内容的作品大量涌现，为魏晋南北朝的出版事业提供了丰富的著作来源。

其次，图书载体材料的革命，纸写本的普及，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出版事业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东汉以后，造纸术得到进一步的改进和推广。在魏晋南北朝，造纸的材料进一步拓宽，除了用麻，还用藤，甚至用海苔。抄纸的工具也从浮式布帘改为浸式竹帘，使纸的生产量大大提高。此外，纸的染潢技术不仅起到防蛀的作用，还增强了纸的美观。造纸术的改进使纸写本逐渐取代简帛书，成为重要的图书形态。不过，这一取代过程经历了一二百年的时间。三国时期即公元3世纪时，纸写本初步流行，图书的载体材料为简、帛、纸三者并行。两晋十六国时期，纸写本逐步推广，图书载体材料出现以纸为主、简帛为辅的局面，到404年，东晋权臣桓玄自立为帝，下令“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1]，这是我国最早的用纸书写的规定。此后的南北朝时期即5—6世纪时，纸写本得到了普及。

【1】[唐]徐坚：《初学记》卷21《纸第七》，北京，中华书局，1962。

第三，图书的流通方式增多，流通速度加快，流通范围更为广泛，是此期出版事业的另一特色。魏晋以后，民间图书市场逐渐增多，繁华的都市里有大批书铺，除固定书铺外，还有送书上门的流动书商。从文献记载上看，当时图书的流通速度也很快，西晋左思《三都赋》出，“洛阳为之纸贵”；南朝诗人谢灵运每有新作，即“宿昔之间，士庶皆遍”。由于社会对书籍需求量不断增加，当时还出现了专门以抄书为业的“佣书”人，“佣书”

业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流通。随着中外交通的发展，魏晋以后，我国的书籍就已通过当时的属国高句丽传入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又传入日本。

第四，纸书卷轴装的出现，是此期图书出版业对中国图书装帧史的一大贡献。魏晋时期，纸张被大量利用后，从抄写到制卷，逐渐改进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纸书卷轴制作制度，其装帧形式可以从敦煌发现的纸卷中得到实证。这种“揽之则舒，合之则卷”^{【1】}的纸书卷轴装深受人们的喜爱，并持续影响了隋唐两代的书籍装帧形式，至今仍为许多书画作品的传统装帧形式所沿用。

【1】[西晋]傅咸：《纸赋》，《艺文类聚》卷5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五，产生于魏晋南北朝的捶拓技术及在此期不断发展的水色印章技术，为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思路，创造了条件。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出版事业的诸多成就，体现了此期出版业不断变革、呈现初兴的时代特点。本卷力图以真实可靠的材料，大体上按照时代背景、编撰出版机构、图书整理编撰与出版活动、重要人物、出版物的材料与形制、图书出版的相关技术、图书的流通与管理等方面展开论述，以求全面系统地展现此期出版事业的面貌，并从中总结相关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出版事业的发展及时代背景	1
第一节 社会动荡与学术思想的活跃	1
第二节 民族融合与南北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15
第三节 中外交通与外来文化的传播	36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出版事业的发展概貌	48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的国家编撰出版机构	58
第一节 三国时期的秘书监、著作郎	58
第二节 两晋时期的秘书监、著作局	67
第三节 十六国时的著作官	78
第四节 南北朝的秘书省与著作官	86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的图书收集整理和出版	118
第一节 三国政府对图书的收集整理和出版	118
第二节 两晋十六国政府对图书的收集整理和出版 ...	125
第三节 南北朝政府对图书的收集整理和出版	137
第四节 私人及寺观对图书的收集整理和出版	151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的图书编撰和出版	169
第一节 经部典籍的注疏和出版	172
第二节 史书的编撰和出版	189
第三节 子部典籍的编撰和出版	211
第四节 文集的编撰和出版	228
第五节 佛经的译撰和出版	245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出版事业的重要人物和事迹	259
第一节 编撰家和翻译家	259
第二节 重要的出版家	283
第三节 佣书人和写经生事迹	302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出版物的材料和形制	316
第一节 三国时期并行的简、帛、纸出版物	316
第二节 两晋十六国以纸为主、简帛为辅的出版物	331
第三节 南北朝纸写本的普及	340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图书出版的相关技术	350
第一节 造纸技术的提高	350
第二节 笔、墨、砚的使用和改进	362
第三节 反书刻印的成熟与传拓技术的出现	374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的图书流通和管理	384
第一节 图书流通的方式	385
第二节 图书发行的种类	406
第三节 南北方图书发行的中心	418
第四节 政府对图书发行的管理	427
第九章 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出版	434
第一节 佉卢字书籍的出版	435

第二节 焉耆—龟兹文书籍的出版	442
第十章 魏晋南北朝图书出版的意义和影响	448
第一节 图书出版事业对社会进步的作用	448
第二节 图书出版技术对后世的影响	453
附录一 魏晋南北朝出版大事记	458
附录二 参考书目	463
后 记	469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出版事业的发展及时代背景

从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开始，到589年隋朝建立为止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王朝更迭，分裂与统一交替。然而，在分裂中走向统一，在战乱中追求和平，一直是此期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因此，社会经济、文化依然在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出版事业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不断进步的。

第一节 社会动荡与学术思想的活跃

魏晋南北朝为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时期，其间战争连绵不绝，政权更迭频繁，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教育事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然而社会的动荡、封建政权的相对软弱，对人们思想的禁锢控制也相对放松，因此这个时期的学术界、思想界又显得异常活跃。加之中国素为崇尚文教的国家，是以包括图书编撰出版在内的文化教育事业，在艰难的条件下仍然有所发展。

一、魏晋南北朝的政权更迭和文化建设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权更迭

1. 三国两晋十六国的兴亡

东汉末的黄巾起义被镇压之后，天下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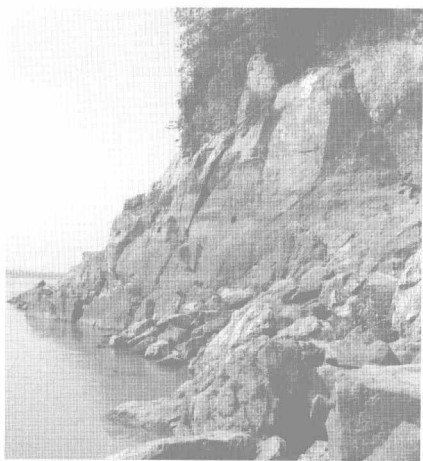


图1
赤壁战场遗址



图2
三国沂南古墓画像石：戏车倒立

208年，孙权、刘备联军在赤壁（今湖北蒲圻）一战中打败曹操（图1），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战后刘备占有荆州大部，从此拥有一个稳定的地盘，曹操退回北方，孙权则稳定了在江东的统治。220年，曹操病死，其子曹丕废汉献帝自立为帝，国号魏（220—265年）。221年，刘备也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221—263年）。222年孙权称吴王，229年正式称帝，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国号吴（222—280年）。这样，正式进入了三国分立的时期（图2）。

三国中，曹魏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最为强大。到齐王曹芳在位时，发生了曹爽与司马懿的权力之争。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处死曹爽及其党羽，曹魏的政权从此就落入司马氏之手。在统治稳固后，司马氏将兵锋外转，于263年出兵灭蜀。265年，司马昭子司马炎接受魏禅，建立晋朝，史称西晋（265—316年）。280年三月，西晋出兵灭吴，再次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然而，西晋的统一很短暂。晋惠帝即位不久，即发生宗室诸王间的混战——“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历时十六年（291—306年）之久，削弱了皇权，耗尽了宗室诸王的实力，也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并导致了“五胡乱华”和北方的持久战乱。

“八王之乱”削弱了西晋的统治力量，给少数民族的兴起提供了有利时机。从304年巴赛李雄和匈奴刘渊分别建立政权开始，迄439年北魏灭北凉为止，共136年，在中国北部和巴蜀地区先后建立了被称为十六国（其实数目不止于十六）的各族政权。其中除了西凉、北燕、前凉、冉魏四个政权为

汉人建立者以外，其余政权的统治者为“五胡”。习惯称这段历史时期为“五胡十六国”或“五胡乱华”。以383年淝水之战为分界点，十六国又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政权有：成汉、汉和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前凉；此期还有鲜卑拓跋部所建代国，及冉闵所建魏国，不在十六国之列。后期政权有：后秦、后燕、南燕、北燕、后凉、南凉、西凉、北凉、西秦、夏；此期另有西燕不在十六国之列^[1]。

【1】《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缩印本)，“十六国”条，589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西晋末年北方大乱，各少数民族竞相建立政权，征战不已。316年，晋愍帝投降刘曜，西晋灭亡。317年，司马睿称晋王，318年称帝，都建康（以避愍帝司马邺讳改），建立东晋（317—420年）。东晋政权为门阀政治，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皇权不振。420年，次等士族出身的刘裕废晋恭帝司马德文，自立为帝，国号宋。东晋灭亡。

2. 南北朝的对峙

从420年刘宋建立，到589年隋灭陈，江南地区连续出现宋（420—479年）、齐（479—502年）、梁（502—557年）、陈（557—589年）四个封建政权，历史上称为南朝。南朝为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过渡的时期，政权更迭比较频繁，政治动荡不安。但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却获得了较快发展。589年，随着陈朝被隋军所灭，南朝的历史走到了尽头。

北方在长期的战乱之后，最终出现了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386—534年）。490年，魏孝文帝元宏亲政后，将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随即又推行改官制、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氏、定族姓等一系列汉化改革，促进了北方的民族大融合。

北魏末年政治矛盾不断激化，523年爆发的六镇起兵，则揭开魏末大动乱的序幕（图3）。534年，北魏分裂为高欢控制的东魏（535—550年）和宇文泰控制的西魏（535—557年）。550年，高欢子高洋废掉东魏，建立北齐（550—577年）。557年，宇文泰子宇文觉也废掉西魏建立北周（557—581年）。577年，北周灭掉北齐，统一北方。北周晚年政治败坏，大权落入外戚杨坚手中。



图3
西魏作战壁画（敦煌285窟）

584年，杨坚废周静帝自立，建立隋朝，北周灭亡。589年，隋灭陈，再次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帝国。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建设

从220年曹丕代汉，到589年隋朝再度统一中国，历时369年之久的魏晋南北朝，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动荡时期。其间战争不断、政权更迭频繁，社会经济遭受重创，作为上层建筑的

文化教育事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然而中国素为崇尚文教的国家，文化的传承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一方面，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文人学士，他们对文化的关注、研究、创作，并没有因为社会的动荡或朝代的变迁而停止，相反，他们对文化的热情有时还因为世易时移而更加高涨。另一方面，魏晋南北朝虽然政权更迭频繁，但新王朝建立后，出于对享国长久的期望和巩固政权的需要，只要稍有可能，统治者莫不提倡教化。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就使得自两汉发展起来的，包括图书整理、出版在内的文教事业，并没有因为战乱动荡而稍歇，甚至在某些领域中，还获得了更大发展。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及其间各族政权在文化建设方面所作的努力，必须予以关注。

1. 三国两晋的文化建设

以文学为例，中国文学史上的“建安风骨”所以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与曹操父子的提倡是分不开的。曹操是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文学家，“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1]。可见，曹操并未因戎马倥偬而漠然文化事业（图4、图5）。魏文帝曹丕更是强调“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2]。魏明帝曹叡亦好尚文辞，与曹操、曹丕，合称曹氏三祖。而文学成就至大者，则推陈思王曹植。辞赋创作的高潮之所以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及辞赋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学体裁，与曹氏父子积极投入辞赋创作，是有一定关系的。辞赋创作的勃兴，也带动了图书出版事业的繁荣，



【1】[晋]陈寿：《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

【2】[清]严可均：《全三国文》卷8曹丕《典论·论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

图4
三国沂南古墓画像石：绳伎倒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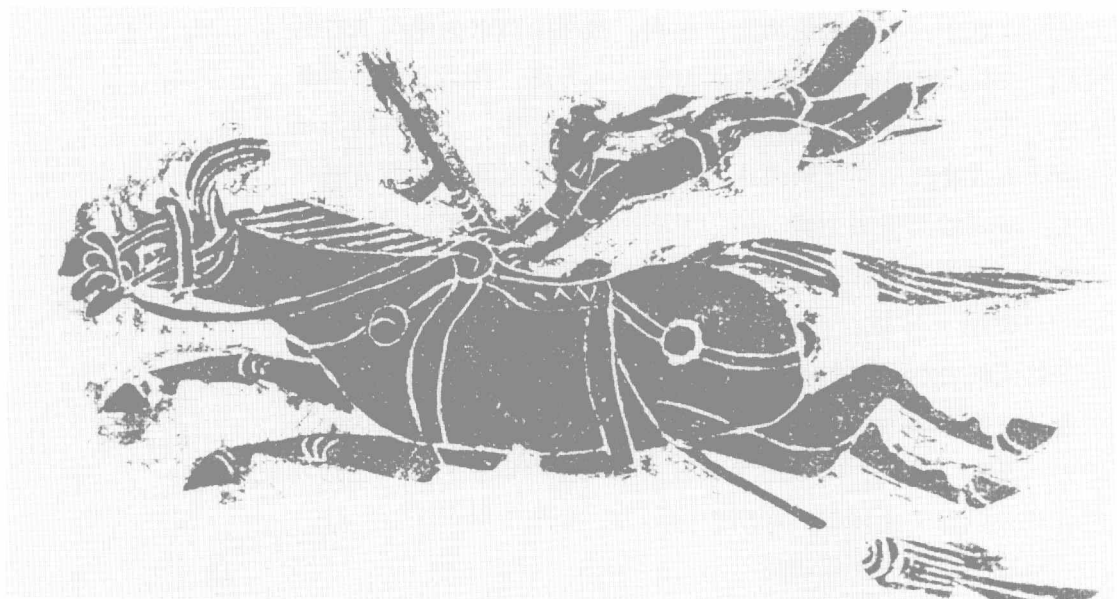


图5
三国沂南古墓画像石：马戏

【1】[唐]房玄龄等：《晋书》卷92《文苑·左思传》：“……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北京，中华书局，1974。

【2】《三国志》卷13《王肃传》及注引《魏略》。

【3】《三国志》卷42《周群传》、《许慈传》、《来敏传》、《尹默传》。

“洛阳纸贵”^{【1】}正是图书出版业繁荣的一个显例。

在古代中国，礼乐教化从来都是治国的重要工具，因此只要有可能，统治者无不有兴学之举。尽管我们可以说，随着东汉帝国的崩溃，经学独尊的地位已经失去，但经学仍然是统治阶级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之一。为了使经学得以传承，曹魏不但恢复了太学的设置，还对当世名儒大加褒奖。这样就在魏国出现一大批讲经、注经的儒师。为宣扬自己的学术观点，他们不但讲论辩难，而且进行了大量的撰述。如王肃遍注群经，对郑玄的学说进行攻击；董遇撰《周易章句》、《老子训注》等，在治经上别开生面；隗禧与人讲《诗》，“又撰诸经解数十万言”^{【2】}。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当时图书出版事业的繁荣。蜀汉虽偏据巴蜀一隅，但在文化建设方面也不甘落后，如刘备在定蜀之后，即设儒林、典学校尉、劝学从事等官，以搜集、整理典籍。而从蜀汉曾设有“博士”一职，可知蜀汉当亦有太学或国子学等教育机构的设置^{【3】}。东吴孙权除自己留心经史之外，还经常劝导部下读书。江东治史者渐多，正是在孙吴政权建立之后，其中成就较大者为虞翻。史载虞翻门徒常有数百人，所训注《易》、《论语》、

《老子》等，皆流传于世。可见，蜀、吴两国的文教、图书出版事业，还是得到一定发展。

以上所论三国时期的图书出版事业，仅仅是就文学创作以及儒学典籍的收集、整理、编纂而言，如果将其时史学、地理学、医学、方伎、农学等方面的著述也考虑进去的话，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三国时期的图书出版业，并未因战争和动乱而停滞不前，相反在某些方面还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两晋时期之兴学，更是史不绝书。西晋泰始八年（272年），在兵事未息，全国尚未完全统一的情况下，即恢复了太学的设置。咸宁二年（276年），又设国子学，教学人员也较曹魏时有所增加。除此而外，西晋还在京师洛阳刻石写经，修明堂、辟雍、灵台，令皇太子亲自释奠祭孔等，无不显示出对文教事业的重视^[1]。东晋虽偏安江南，亦未尝忘怀于兴学，建武元年（317年）十一月，司马睿即因王导、戴邈等人之请，建立太学，其后晋成帝、晋孝武帝时，都有兴学之举，教育机构、学生人数都有较大发展^[2]。两晋时期文教事业的发展，必然对其时图书典籍的收集、整理和编纂要提出新的要求。早在三国时期，曹魏即开始大规模收集散佚的图书典籍，命秘书郎郑默进行整理，制成《中经》。到西晋时期，秘书监荀勖又以《中经》为蓝本，制作《新簿》，确立了中国古代图书分类方法上的“四部”分类法。经过此次整理后，西晋国家藏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3]。经过这两次由国家主持的大规模校书之后，魏晋的图书业臻于一时之盛。然而西晋末年的战乱，却又使得好不容易鸠聚起来的图书典籍再次受到重创，即所谓“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4]。东晋从建立之初，即开始对图书典籍进行收集整理，后经著作佐郎李充整理校订，共得三千余卷，这个数字虽仅为西晋极盛时的十分之一，但却为江南地区的图书出版、编纂事业在东晋南朝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2. 南朝的兴学

早在刘宋建立之前，宋武帝刘裕即开始关注文教事业，如义

【1】[梁]沈约等：《宋书·礼志》、《晋书·裴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宋书·礼志》、《晋书》之有关本纪及列传。

【3】[唐]魏征等：《隋书》卷32《经籍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3。

【4】《隋书》卷32《经籍志一》。

【1】《隋书》卷32《经籍志一》。

【2】《宋书》之《范泰传》、《何承天传》、《周续之传》、《雷次宗传》、《明帝纪》。

【3】《隋书》卷32《经籍志一》。

【4】[梁]萧子显：《南齐书》之《高帝纪》、《武帝纪》、《王俭传》、《刘瓛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

【5】[唐]姚思廉：《梁书》之《武帝纪》、《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

【6】《隋书》卷32、33、34、35《经籍志一、二、三、四》。

【7】《隋书》卷32《经籍志一》有云：“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由此可见萧梁图书出版发行范围之广泛。

【8】《隋书》卷32《经籍志一》。

熙十二年（416年）北伐关中，收得姚秦官府藏书四千余卷^{【1】}。及刘宋始建，刘裕即下诏立学。到孝武帝大明五年（462年）国子学终得确立。从总体情况看，刘宋官学（国学）不及两晋，但私人办学却有较大发展，这与刘宋统治者的奖助有很大关系，如宋武、宋文、宋明诸帝，都曾资修学馆、召见名儒、接见诸生，对文化教育事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2】}。在刘宋诸帝的热情关注下，刘宋时期的图书收集整理工作，获得空前发展，宋文帝元嘉八年（431年），国家藏书即达64 582卷，到后废帝元徽元年（473年），又得15 704卷^{【3】}。萧齐建元、永明、永泰年间，国家都曾有立学之举，王俭、刘瓛的私学也曾得政府的资助，这些举措在成效上，可能有小大之分，而崇尚文教的传统却不能被抹杀^{【4】}。萧梁时期的学校教育更有所发展，这与梁武帝本人较高的学识才华有一定关系。梁武帝即位不久，即下诏兴学，在东山为名儒何胤兴建学馆、招聚生徒。天监四年（505年）又设五经博士，七年（508年）下诏建立国学，九年（510年）令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入学就读，大同七年（541年）又创立文林馆，延集学者讲述^{【5】}。与大规模兴学同时进行的，是萧梁政府对图书典籍的收集、整理与编辑出版。梁武帝本人在学术和文学上都很有成就，据《隋书·经籍志》所载，梁武帝一生著述、编纂的各类文籍共有29种、730卷之多^{【6】}。在梁武帝的身体力行和大力提倡下，萧梁的文教事业盛极一时，图书典籍的编纂出版也出现空前繁荣的景象^{【7】}。但“侯景之乱”却几乎毁灭了萧梁的全部官藏典籍。梁元帝萧绎在乱平后，立即着手征集公私藏书，共得七万余卷，全部运到新都江陵。然而这批劫后重生的典籍，不久又随着江陵被北周攻破而遭灭顶之灾^{【8】}。陈在南朝诸政权中国力最弱，直到世祖陈蒨即位后，才有暇对图书典籍进行收集整理，其后诸帝也多次有兴学之举，但终因国力单弱、境域狭促而终无大成，因此，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来说，陈朝的图书出版业都无法与萧梁时期相比。